

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比较分析*

金晓彤¹ 杨潇²

内容提要: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能力、社会保障和个体差异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并针对研究对象的特点,扩展分析了家庭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同时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子女数量和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情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是否是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显著作用。此外,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和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青年 发展型消费 学习消费 人情消费

一、引言

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影响下,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其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愈加受到各界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1980年之后,户籍身份在农村并在农村长大,在其持续受教育经历中未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现已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金晓彤、崔宏静,2013;金晓彤、杨潇,2015)。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呈现出诸多群体性特征(刘传江,2010),尤其是其消费特点格外鲜明(唐有财,2009)。作为深受城乡体制影响的青年群体,他们消费的意义已经超出满足温饱或者维持日常生活的范畴,对他们而言,消费是一种个人表达方式,是取得社会认同、完成城市融入的重要途径(金晓彤、崔宏静,2013)。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一些能够彰显个性、表达消费主张的消费项目中,例如在手机、服装消费等方面出手阔绰(杨善华、朱伟志,2006;王艳华,2007),而在饮食、住宿等日常基础消费项目上又秉承其父辈惯有的节俭(吴维平、王汉生,2002)。故而,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问题的研究中,应该注重乡村成长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应该关注城乡身份转换给他们带来的作用,同时也应注意到其青年群体的身份特点。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现阶段农民工群体的构成部分,而且随着新老农民工更替过程的推进,他们也是未来城镇社会的重要劳动力来源,并最终为人父母,逐渐承担起社会、家庭的多重责任。遗憾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仍低于第一代农民工群体(钱雪飞,2010),而独特的消费习惯也致使他们无法像父辈那

*本文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项目编号:12JZD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消费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AZD0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调整型经济增长对我国居民可持续性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3JJD790011)的资助。

样储蓄大部分资金以补贴家用或者为未来生计做打算(何明洁, 2008)。对青年群体来说, 当今的消费行为及消费习惯对其未来皆具有一定影响, 无论是充斥着炫耀意味的盲目消费, 还是为增加积蓄而节衣缩食的紧缩型消费, 都不应该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最佳消费方式选择。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 消费资料被划分为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马克思、恩格斯, 2009)。据此, 本文将消费行为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三种类型。其中, 生存型消费是指为了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和劳务消费; 发展型消费是指消费者为了实现自身发展而进行的各项支出; 享受型消费则是指出自享乐目的所进行的消费。作为青年群体, 增加发展型消费的比重无疑是新生代农民工较优的消费选择。因此, 本文研究选择发展型消费行为作为分析重点, 并将其划分为学习消费与人情消费两个方面。无论是为了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所进行的学习消费, 还是为了拓展社会资本所进行的人情消费, 都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获得更好的工作及生活条件, 对该群体的职业生涯与未来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对其个人发展与家庭和谐大有裨益。基于此, 本文以上述两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行为为研究重点, 通过文献整理及实证分析, 挖掘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行为的作用机理。

目前, 关于农民工群体消费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做如下划分: 第一, 对农民工消费情况的描述性或概念性探讨, 涉及消费结构、消费特征、代际差异等方面(例如成志明、沈蕾, 2013; 刘林平、王茁, 2013; 段成荣、马学阳, 2011)。此类研究近年来逐渐得到不同学者的补充与完善。第二, 针对某种具体消费行为的情况描述、代际比较或趋势分析, 包括春节消费(例如梁库等, 2014)、集体消费(例如周林刚, 2007)、手机购买(例如华豫民, 2010)等。此类研究不断充盈, 为后续研究展示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同方面消费的大致情况。第三, 对农民工总体消费或某种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例如, 钱文荣、李宝值(2013)和孔祥利、粟娟(2013)分别从条件不确定性、消费约束等经济学视角对农民工总体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 再如汪丽萍(2013)从社会学视角对炫耀性消费、认同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相对而言, 对前两类消费问题的探讨较为热烈, 而对农民工,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的探讨还稍显不足, 而其中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更有意义的发展型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则更为稀少。现有研究多将学习消费视为一种纯投资行为, 多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 依托资本投资决策理论或效用理论, 讨论不同类型农民工对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投资所需的时间、经济投入与相应产出之间的关系(例如何亦名, 2014; 安海燕、钱文荣, 2015), 甚少有研究将其视为日常消费, 从个体层面探讨其作用机理。对于人情消费的探讨, 也多集中于其支出领域与消费种类、消费方式与规模、消费心理与动机以及人情消费的变化趋势, 亦或通过访谈等方式对人情消费的影响因素加以描述(例如陈浩天, 2011; 刘艺, 2008; 金晓彤、陈艺妮, 2008)。

本文由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性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入手,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与整理, 从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和个体差异三个方面筛选该群体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收入情况作为经济因素始终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具有重要作用(潘洪涛、陆林, 2008)。收入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展开各项消费的经济基础, 也是他们现在以及未来生活的重要保障。本文同样引入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提供保障的其他社会性因素, 例如工作稳定性、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参见钱文荣、李宝值, 2013)。此外, 个体差异例如性别、年龄、子女数量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都可能存在影响(参见孔祥利、粟娟, 2013)。上文所述的诸多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消费行为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然而, 发展型消费是消费领域中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特殊消费, 不仅受到一般性消费影响因素的影响, 还受到其他更具针对性因素的影响, 例如衡量个体对文化资源占有情况的文化资本变量(亢晓莉、陈理宣, 2013)。刘辉武(2007)认为, 农民工先天文化资源条件较差, 加之文化资本缺乏, 直接影响

了该群体成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并且导致了市民对农民工的文化排斥，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亢晓莉、陈理宣（2013）的研究也表明，家庭的文化资本状况对个体学习环境、性格品质、进取意愿都具有一定影响，进而也将影响个体的文化水平。在已有研究中，文化资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内的文化能力型文化资本，另一类是以学历、职业证书等表现出来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刘辉武，2007）。同时，经典研究佐证，受教育年限比学历水平更适合进行回归分析（Mincer，1974）。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制度化文化资本来表现文化资本存量，以样本自身受教育年限及其父母受教育年限等指标来间接衡量其家庭文化资本水平，并将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概况为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能力、社会保障和个体差异四个方面。同时，为更深入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行为的独特之处，本文研究引入同龄城市青年群体进行对比，即选择与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量匹配的1980年后出生、户籍身份在城市并在城市长大、现已在城市工作的青年群体，对比分析两个群体发展型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的异同。同时，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及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方案与样本描述

通过与16位新生代农民工、15位“80后”城市青年的深度访谈，结合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本课题组统计并整理了具有代表性的新生代农民工及城市青年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完成了问卷编制。为保证调查的严谨性，课题组按照《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农民工地域分布情况^①，抽取相同生源地比例的在校本科生及研究生作为调查员，于2015年1月举办了以“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和消费行为”为主题的社会调查方法专项培训，指导所培训的调查员在寒假返乡期间，随机选取数量匹配的新生代农民工及同龄城市青年完成问卷调查。此次调查范围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7个城市，共发放问卷2200份，回收2129份，获取有效问卷2014份，有效率达91.55%，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信息

项目		样本量	比例（%）	项目		样本量	比例（%）
样本类型	新生代农民工	997	49.503	性别	男	894	44.389
	同龄城市青年	1017	50.497		女	1120	55.611
年龄 (以调查时为准)	20岁及以下	162	8.044	工作地区	东部	802	39.821
	21~25岁	636	31.579		中部	670	33.267
	26~30岁	758	37.637		西部	542	26.912
	31~35岁	458	22.741	合计	—	2014	100.000

为保证对比分析结果的有效性，课题组注重在同一调查区域内选择数量基本相同的新生代农民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2014年。本文对地域的划分亦与《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相同，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区）。

工与同龄城市青年样本。此外,本文另验证了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地域分配情况:东部地区 397 人,中部地区 331 人,西部地区 269 人,比例约为 1.47 : 1.23 : 1,与《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所示比例基本持平(1.47 : 1.31 : 1)^①。

(二) 分析方法与计量模型

为了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及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本文首先建立如下消费模型:

$$y_i = \beta_0 + \beta_1 x_{1i} + \beta_2 x_{2i} + \dots + \beta_k x_{ki} + u_i \quad (1)$$

(1) 式中, y_i 表示发展型消费水平; $x_{1i} \dots x_{ki}$ 代表本文所选择的不同影响因素; β_k 表示相应影响因素的待估系数; β_0 表示截距; u_i 为误差项。在对(1)式的检验中发现,随机误差项的方差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表明模型存在异方差性,即:

$$D(u_i) = E(u_i^2) = \sigma_i^2 = f(x_{ji})\sigma_u^2$$

因此,本文选用 $\sqrt{f(x_{ji})}$ 去除(1)式,使之变成下式:

$$\begin{aligned} \frac{1}{\sqrt{f(x_{ji})}} y_i = & \beta_0 \frac{1}{\sqrt{f(x_{ji})}} + \beta_1 \frac{1}{\sqrt{f(x_{ji})}} x_{1i} + \beta_2 \frac{1}{\sqrt{f(x_{ji})}} x_{2i} + \dots \\ & + \beta_k \frac{1}{\sqrt{f(x_{ji})}} x_{ki} + \frac{1}{\sqrt{f(x_{ji})}} u_i \end{aligned} \quad (2)$$

(2) 式中, $\sqrt{f(x_{ji})}$ 表示权重。本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2)式进行回归。

(三) 问卷内容与变量设计

本文研究调查问卷由五个部分构成,分别为样本基本信息、家庭文化资本情况、经济能力、社会保障情况和发展型消费情况。其中,样本基本信息包括样本类型、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务工地区等内容,本文选取样本类型、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量作为自变量进行下一步分析。家庭文化资本以样本受教育年限及样本父母受教育年限来表征,并选作自变量进行分析。经济能力部分则通过调研样本上年月平均收入,记为样本收入水平,并作为自变量进入模型分析。发展型消费分为学习消费、人情消费两个部分,在城乡青年消费行为对比分析中作为因变量进入模型。在社会保障情况部分,问卷设置了“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是否拥有稳定的医疗保险(6个月及以上)”、“是否拥有除医疗保险以外其他稳定的社会保险(6个月及以上)”三个问题。在一般公司所提供的社会保险中包含医疗保险,然而,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及其他商业医疗保险的存在,部分没有其他社会保险险种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青年仍拥有医疗保险。调查前的深度访谈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医疗保险的重视程度较高且参保意愿强烈,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险的重视程度及参保意愿则较低。近年来,医疗问题的社会影响较大,加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普及以及政府的大力宣传,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医疗保险更为看重。上述认识在同龄城市青年群体中也较为普遍。为此,本文将社会保险分为医疗保险与其他社会保险两个部分,分别加以测度和分析。结合调查问卷内容及分析模型,本文研究所选变量的定义、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网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2015 年。

赋值及统计量如表 2 所示。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发展型消费	学习消费	上一年内为自身学习所支出的资金总额（元）	546.758	1132.301
	人情消费	上一年内为人情往来所支出的资金总额（元）	2630.903	3182.101
群体划分	样本类型	新生代农民工=0, “80 后” 城市青年=1	0.505	0.500
家庭文化资本	样本受教育年限	样本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	11.224	3.984
	父亲受教育年限	样本父亲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	7.990	4.336
	母亲受教育年限	样本母亲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	7.116	4.500
经济能力	收入水平	上年月平均收入（元）	3742.622	2314.836
社会保障	合同签订	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否=0, 是=1	0.568	0.495
	医疗保险	是否拥有稳定的医疗保险（6 个月及以上）：否=0, 是=1	0.497	0.500
	社会保险	是否拥有除医疗保险以外其他稳定的社会保险（6 个月及以上）：否=0, 是=1	0.379	0.485
个体差异	性别	性别：男=0, 女=1	0.556	0.497
	年龄	实际年龄（岁）	27.023	4.379
	婚姻状况	是否结婚：否=0, 是=1	0.420	0.494
	子女数量	拥有子女数量（个）	0.440	0.645

三、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 SPSS18.0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分析内容由均值比较和多元回归两部分构成。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均值比较

本文对比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两个子样本的基本信息及发展型消费情况，结果如表 3 所示。数据表明，与同龄城市青年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呈现出一些较显著的差异：低家庭文化资本、低社会保障、低月收入水平、低发展型消费水平。在发展型消费的对比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情消费和学习消费皆显著低于同龄城市青年；而在发展型消费与收入之比的对比中，人情消费与收入之比在两类群体之间并无明显差异，而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与收入之比则显著落后于同龄城市青年。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学习消费不高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收入水平问题，对此下文将展开进一步分析。

指标	新生代农民工	同龄城市青年	F 值
年龄	27.647	27.413	1.466
婚姻状况	0.513	0.335	67.688***
子女数量	0.600	0.283	129.306***
样本受教育年限	8.998	13.402	885.229***
父亲受教育年限	6.264	9.678	369.137***
母亲受教育年限	5.302	8.891	380.638***

(续表 3)

合同签订	0.465	0.669	89.011 ^{***}
医疗保险	0.341	0.648	209.291 ^{***}
社会保险	0.255	0.501	138.102 ^{***}
收入水平	3288.865	4188.323	78.799 ^{***}
学习消费	281.590	804.490	110.758 ^{***}
人情消费	2228.120	3026.450	31.731 ^{***}
学习消费与收入之比 (%)	0.713	1.600	59.236 ^{***}
人情消费与收入之比 (%)	5.646	6.022	0.436

注: ***表示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二) 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回归分析

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两类发展型消费支出与消费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文发现, 样本父亲受教育年限与母亲受教育年限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 (0.787), 婚姻状况与子女数量之间相关系数较高 (0.764), 其他自变量间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为此,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剔除了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状况两个变量。

1. 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总体影响因素分析。本文首先选择所有样本, 分别以学习消费、人情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 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总体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学习消费		人情消费	
	回归系数	t 值	回归系数	t 值
常数	-412.309 ^{**}	-3.026	-2016.963 ^{***}	-4.020
个体类型	139.275 ^{**}	3.172	246.629	1.558
样本受教育年限	21.990 ^{***}	4.310	69.014 ^{**}	3.151
母亲受教育年限	15.334 ^{**}	2.856	-3.427	-0.196
收入水平	0.091	8.015	0.498 ^{***}	14.219
合同签订	16.985	0.373	-282.846	-1.799
医疗保险	88.985	1.707	-195.501	-1.100
社会保险	124.766	1.670	296.189	1.620
性别	122.838 ^{***}	3.232	90.096	0.677
年龄	1.558	0.307	71.670	1.768
子女数量	-50.552	-1.566	223.235 ^{***}	3.903
F 值	33.613 ^{***}		34.405 ^{***}	
调整的 R ²	0.145		0.147	

注: ***表示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如表 4 所示, 两个回归方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明所选模型对青年的两种发展型消费行为皆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另由回归结果可知, 个体类型、样本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性别 5 个变量对学习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样本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及子女数量 3 个变量对人情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个体类型对学习消费影响显著,即“80后”城市青年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上一年为自身学习支付了更多资金。据此本文认为,上述差异可能源于城乡不同的教育环境。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教育条件还未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农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可能受到影响,即便他们长大后转移到城市生活,农村成长经历所带来的学习兴趣和消费意愿偏低的情况仍未能得到改变。样本自身受教育年限及母亲受教育年限长的青年更倾向于进行学习消费,家庭文化资本对学习消费的影响得到了验证。发展型消费对于个体具有积极影响,是年轻群体为未来生活进行投资的重要表现。受教育年限对发展型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个体生活技能,更对其未来发展具有较强的影响,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青年工作后重塑自我意愿的强烈程度与为自我提高的付出情况具有重要作用。收入水平对学习消费、人情消费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与“80后”城市青年作为年轻群体的代表,其收入水平一般不高,而本文所选择的两种发展型消费的支出皆为生活中的非必要支出,其消费状况受收入制约也更加严重。

在社会保障因素方面,合同签订、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和“80后”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皆无显著的作用。诸多消费理论认为,未来生活稳定性及保障程度都对个体当下消费行为具有影响。但是,对于青年群体,他们多处于工作转换频繁、未来规划模糊的生活状态中,对工作稳定性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因素关注程度较低,其消费行为受社会保障因素的制约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工作合同期限长短、是否拥有“五险一金”等因素是衡量一份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一般而言,工作条件较差的青年更愿意付出更多投资以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即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青年可能更倾向于扩大发展型消费。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推测:合同签订、医疗保险、其他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与青年群体发展型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非常复杂,难以用线性关系来描述。在个体差异方面,子女数量对人情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文分析显示,子女数量与婚姻状况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有子女的个体大多已婚,具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更多的人情支出。同时,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对学习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女性青年的学习消费支出多于男性,其作用机理将在后文对两类群体发展型消费相互对比的回归分析中加以说明。

2.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为了深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与“80后”城市青年在发展型消费作用机理方面的异同,本文分别以两个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结果

变量	学习消费				人情消费			
	新生代农民工		同龄城市青年		新生代农民工		同龄城市青年	
	回归系数	t值	回归系数	t值	回归系数	t值	回归系数	t值
常数	-155.871	-1.137	-556.236***	-4.267	-1888.026**	-2.768	-1219.814	-1.591
样本受教育年限	19.547***	3.706	22.808**	2.643	79.714*	1.960	89.352**	3.359
母亲受教育年限	10.437**	3.466	12.794	1.374	13.050	0.571	-23.893	-0.963
收入水平	0.041**	3.279	0.134***	7.056	0.497***	10.157	0.505***	10.359
合同签订	165.482	1.805	-230.222	-1.815	-144.538	-0.799	-289.920	-1.148
医疗保险	-102.722	-1.932	420.742	1.801	-368.739	-1.659	-39.478	-0.149
社会保险	83.060	1.390	139.158	1.434	417.185	1.748	259.664	1.008
性别	65.442*	2.312	172.764	1.701	319.814*	1.965	-209.739	-1.034
年龄	-0.603	-0.121	5.008	0.497	54.477	1.212	47.909	1.668

(续表 5)

子女数量	-16.375	-0.551	-148.775	-1.868	175.046*	2.536	466.297*	2.078
F 值	8.985***		20.845***		15.017***		23.020***	
调整的 R ²	0.071		0.154		0.116		0.167	

注：***表示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学习消费方面，“80 后”城市青年自身学习支出受收入水平、样本受教育年限显著的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学习支出受样本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和性别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两个群体人情消费都显著地受到样本受教育年限、个人收入和子女数量 3 个变量的正向影响。此外，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人情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同龄城市青年群体中并不显著。综上所述，样本受教育年限、个人收入、子女数量 3 个变量对两个群体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基本相同，而母亲受教育年限和性别 2 个变量则在不同群体上显示出不同的影响。下面将对上述两处差异进行深度探讨。

已有文献表明，当经济状况较差时，父母学历与子女的升学意愿正相关（Behrman and Wolfe, 1984）。相对于城市青年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成长过程中经济条件较差，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其继续学习意愿确有一定影响。对于上述结果，本文做出如下可能的解释：在新生代农民工成长过程中，城市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教育水平持续提高，与之相比，农村教育基础则过于薄弱，教育氛围不佳，此时家庭教育情况便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意愿产生很大影响。对于“80 后”城市青年而言，良好的学校教育环境能够适当弱化不同家庭教育水平对子女的影响，从而弱化父母在其持续学习意愿形成中的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影响下的教育条件差别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持续学习意愿更依赖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成长环境与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文研究还表明，性别对两类青年群体发展型消费的作用不同，该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和人情消费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女性的发展型消费多于男性。上述结果可能与城乡两地对于两性地位的认识有一定关系。与农村相比，城市对于男女平等及女权思想的接受程度更高，特别是对于年轻群体而言，两性在个人未来投资方面的差异不大。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则更加倾向于为自身学习与人际关系维护支出更多资金。沈渝（2010）提出，基于较为传统的社会认知，女性农民工在职业、家庭、社会网络等方面始终身处劣势，而她们更倾向于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并愿意付出努力。胡宏伟等（2011）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虽然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但她们能够积极应对，反而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在注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点的基础上，本文研究提炼了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并利用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分析结果显示：与同龄城市青年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水平仍显落后，该群体对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仍显不足。同时，两个群体发展型消费的作用机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样本受教育年限和个人收入对两个群体的发展型消费都具有显著作用，而母亲受教育年限仅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性别则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及人情消费。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拓展发展型消费，引导他们优化自身消费结构。政府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问题的重视，在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农

民工工作地等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地加强宣传,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行为,抑制不合理支出,优化该群体消费结构,以促进该群体未来生活品质的改善。第二,重视文化资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作用,致力于农村教育条件的改变。政府应在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的同时,注重补充农村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并为农民子女教育提供优惠政策。第三,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行为独特性的动态研究,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扶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应在把握该群体与相关群体异同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该群体行为的独特性及其产生原因,以便相应扶持政策的完善与优化。

参考文献

1. Behrman, J. and Wolfe, B.: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 of Schooling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6(2):296-303, 1984.
2. Mincer, J.: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4.
3. 安海燕、钱文荣:《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年第2期。
4. 成志明、沈蕾:《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特征研究》,《商业时代》2013年第31期。
5. 陈浩天:《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地区人情消费的行为逻辑》,《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7期。
6. 段成荣、马学阳:《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状况分析》,《劳动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7. 何明洁:《工作:自我转换的平台——服务业青年女性农民工日常工作研究》,《青年研究》2008年第2期。
8. 何亦名:《成长效用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10期。
9. 华豫民:《基于顾客价值理论的农民工手机购买行为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9期。
10. 胡宏伟、曹杨、吕伟:《心理压力、城市适应、倾诉渠道与性别差异——女性并不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更严重》,《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
11. 金晓彤、陈艺妮:《我国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的动机分析》,《消费经济》2008年第5期。
12. 金晓彤、崔宏静:《新生代农民工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探析——基于社会支持、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作用》,《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1期。
13. 金晓彤、崔宏静:《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与炫耀性消费的悖反性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7期。
14. 金晓彤、杨潇:《差异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31省(市)4268个样本的实证研究》,《青年研究》2015年第3期。
15. 亢晓莉、陈理宣:《试论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16. 孔祥利、粟娟:《我国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8省区1860个样本调查数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7. 梁库、金晓彤、佟金昱:《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春节返乡消费特征分析——以冀北横河村“90后”群体为例》,《经济视角(上旬刊)》2014年第8期。
18. 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19. 刘辉武:《文化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村经济》2007年第1期。
20. 刘林平、王苗:《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80后农民工与80前农民工之比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1. 刘艺:《论农村人情消费》,《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3. 潘洪涛、陆林:《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市场》2008年第9期。
24. 钱文荣、李宝值:《不确定性视角下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679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中国农

村经济》2013年第11期。

- 25.钱雪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情况及影响因素》,《当代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 26.沈渝:《城市融入中的社会性别研究》,《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8期。
- 27.唐有财:《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12期。
- 28.汪丽萍:《融入社会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市民化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农村经济》2013年第6期。
- 29.王艳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5期。
- 30.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 31.杨善华、朱伟志:《2006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 32.周林刚:《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与农民工集体消费——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4期。

(作者单位: ¹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²吉林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 李腾飞)

(上接第12页)

- 29.Hansen, L. P.: Large Sample Properties of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Estimators, *Econometrica*, 50(4):1029-1054, 1982.
- 30.Harris, J. R. and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1): 126-142, 1970.
- 31.Hu, X.; Cook, S. and Salazar, M. A.: Internal Migration and Health in China, *The Lancet*, 372(9651):1717-1719, 2008.
- 32.McDonald, J. T. and Kennedy, S.: Insights into the “Healthy Immigrant Effect”: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Service Use of Immigrants to Canad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9(8): 1613-1627, 2004.
- 33.Mincer, J.: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4.
- 34.Sundberg, G.: Health, Work-Hours and Wages in Sweden, in Zweifel, P.(ed.): *Health,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Regulation*, Springer, 1998.
- 35.Zellner, A. and Theil, H.: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Simultaneous Estimation of Simultaneous Equations, *Econometrica*, 30(1): 54-78, 1962.

(作者单位: 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杜鑫)